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与国际影响

唐海军 章德彪

摘要：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结构支撑，是中共几代领导集体创立、继承和不断创新发展的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三个“新就新在”的重要论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多个层面展示出对旧式特别是西方政党制度的明显优越性，受到不少发展中国家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高度关注，成为对外宣介“中国方案”的重要精神财富。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创新；影响

中国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706(2019)02-0025-05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第十三届政协会议期间，首次公开阐释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并从比较传统的旧式政党制度积弊的视角，系统阐述了三个“新就新在”的重要观点，这对于人们更好地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中国政党制度的稳定性与体制功能得到了日益增多的国外政党和其他政治力量、部分专家学者的理解、认同乃至赞赏，越来越成为他们理解和揭示中国奇迹与发展模式成功的“奥秘”所在。

一、中国政党制度是当今世界政党制度范畴中的一种新范式

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主流政治，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有180多个国家实行政党

政治。政党制度作为一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指一国内掌握或可能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的法律地位，以及它们同其他政党及政权之间的关系”。^①相对于西方一些国家形成并稳定运转数百年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无疑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说它“新”，主要在于：第一，形成的时间相对新。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始于英国，从托利党、辉格党1679年创立到现在已有300多年的历史，^②其中，多数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大都有一二百年的历程。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对来讲则要晚得多，从创立至现在不过才70多年的历史，属于一个后来者。第二，形式相对新颖。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党

本文为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阶段性成果。

① 钟清清主编：《世界政党大全》，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973页。

② 王家瑞主编：《当代国外政党概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第796页。

制度都是一种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其政党一般存在执政党、反对党或在野党等分类。实行所谓“多党民主、选举政治”，其政治运作总体上通过选举这一制度安排来实现政党之间的权力交替，即不同党派轮流执政。中国政党制度却是不同于国外传统政党制度的一种新型制度，它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多党制，它是一种合作型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是一种“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新型关系，在中国不存在反对党或在野党，也没有轮流执政的政治现象，不同形式的选举针对的不是政党间的轮替，而是针对于国家公职人员具体任期的限定。第三，政党性质的独特。国外政党制度特别是那种传统的旧式政党制度，各类政党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对峙突出的时候，政党间的阶级对立相当尖锐，没有哪一个政党称得上是完全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应当说，中国的政党是一种目标、利益与价值凝合的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同各个民主党派总体上是“志同道合”者，不存在根本利益之间的争斗。第四，政党属性的新型性。旧式的政党都是各自完全独立于他党的平行政治实体，在国家的政治博弈中可以“天马行空”、各行其是。而中国政党制度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各民主党派，虽然所有的政党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政党框架内，所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发挥的影响也是有明显差别的，各民主党派要自觉地服从中共的领导。中共这个执政党是领导一切的，各民主党派则没有这种地位和影响力。国外一些左翼政党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现实的“中国式民主”。

二、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一种创新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创立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指针。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建立并进行活动的。我们党也不例外，同样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指导下创立、发展并不断成长和强大起来的马克思

主义执政党。中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它始终忠实地继承并捍卫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思想，包括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坚持党对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事务的领导权，建立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等；另一方面，中共的历代领导人，无论在什么形势下，都不是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学说，而是根据中国自身实际，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不断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创立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这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并在具体内容上不断赋予这一制度以诸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思想、新论断。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在怎样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问题上，我们党近几十年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这种新型政党制度，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更加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副主席诺维科夫、俄罗斯远东所中国当代历史和国情研究中心主任马马耶娃等为此表示，“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它经受了中国历史实践的选择与考验，并在不断地进化和完善。

同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是在汲取中华五千年优秀文化素养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它秉承了“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①这一政党制度是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的，是符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它经受住了各种历史风浪的考验和历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的执政党和参政党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展示了更高的效率，体现了更加明显的制度优越性，为迅速地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促进社会稳定、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进而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制度保障。还要看到，由我国政党制度所造就的“中国之治”，得到世界上

^① 习近平：《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

不少国家政党及专家学者的高度赞赏和关注，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俄罗斯远东所中国制度研究专家斯米尔诺夫等认为，中国所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历史经验是独一无二的，这源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理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有机结合，并且强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基础上的中国政党制度”，是“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突破的重要武器”。

三、中国政党制度相较于国外特别是西方传统政党制度在内容上展现出显著的新特点、新优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新就新在”所揭示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很多方面克服并避免了国外多党竞争制度下的弊端，尤其是在实践上展现出显著的制度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我们是共识政治，而他们则是竞争政治。总体而言，政治的共识大都是建立在思想的共识和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同各个民主党派的活动，都是在中国政治共同体的制度框架下运作的。所以，我们党和国家所作出的决策，从政党层面来讲，是在赢得最广泛的政治共识而首先是中共与八个民主党派获得共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它以服务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其出发点，同时它也凝聚了最广泛的民众共识、社会共识，为此求得了最大的公约数，这在外国多党制国家是难以做到的。正如俄罗斯公正俄罗斯党国际部长别尔纳茨基表示，“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这种合作型政党制度的体制保障”。而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特征，则是一种明显的竞争性政治景象，不同的政党由于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群体有异，其政策重点和价值诉求必然存在相当的差异乃至对立，像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大都只能在双方之间的最小共同点上达成一致，求得某些政策共识。而在多数领域，更突出的政治景象是双方面的竞争。在西方多国政坛，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斗争是主旋律，形成共识多是交易和妥协的结果。如果说它们也能达成共识的话，那多是为了“政治分肥”与“利益媾和”。第二，我们是合作政治，他们是“否决政治”。合作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不管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作为执政的中共始终保

持着同各个民主党派的精诚合作关系，特别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与重要决策上，执政党和参政党都是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即“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的模式，由此形成最终意见，并上升到政策直至法规法律的层面加以贯彻实施，充分地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和功能。国外特别是西方政党之间不能说没有合作，但它们是在斗争基础上的合作，是实力与利益博弈下的合作，合作是有限度的。应当看到，近年来西方许多国家内部政治极化态势日益明显，反对党、在野党对执政党政策制定的不合作现象趋于突出，同时，执政党对于反对党、在野党利益诉求的容纳与妥协度也在明显降低，由此导致“否决政治”现象频繁地出现。如比利时、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反对党多次否决执政党提出的相关议案。第三，我们是民主政治，他们是精英或官僚政治。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它决定了我们实行的是民主政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各自渠道、方式，来广泛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参政议政热情，为最终实现政党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执政党和参政党因此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衷心拥护。应当看到，当前国外特别是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党政治，则在日益走向专业化、官僚化的轨道，政党精英治国的势头愈加明显，政党的活动特别是其决策，同普通民众的现实意愿和诉求愈加脱节，由此带来各类精英与普通大众的对立越来越严重。美国民主党的希拉里竞选总统最终落败，实际上反映了本国许多民众对精英政治的“反叛”，他们用选票表达了对美国孤芳自赏的官僚精英阶层的反抗之心。就连一贯自称亲民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当前在部分普通的老党员眼中，都“已经不是原来曾经熟悉的那个党了”。

四、中国政党制度在于它始终具有批判和斗争精神，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同心协力，精诚合作、并肩作战，在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取得了令世界许多国家政党为之惊叹的伟大成就，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和衷心拥护，我们无疑有理由为此称赞和自豪。

实际上,无论是中共还是各个民主党派,从未因此居功自傲。特别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头脑十分清醒,忧患意识更加强烈,它始终在不断地告诫和提醒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存在着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并一再告诫全党,在前进道路上,我们应不忘初心,要永远保持一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要勇于变革、敢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和懈怠,随时准备应对当前和今后将面临的各种重大挑战、抵御各类重大风险、克服各种重大阻力、解决一切重大矛盾。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党更是在致力于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深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中,我们党所表现出的这一胆魄、气势、毅力与精神,为国外诸多政党所羡慕和钦佩。

纵观国外尤其是西方许多国家的主流政党,其状况与表现则是另一种景象。尽管有关“政党变革”的理念在20世纪初就由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提出并开始使用,^①但实际上西方大多数国家自二战后没有实行根本意义上的政党变革。冷战后以来,西方大多数的政治家和社会精英都沉醉在“历史的终结”梦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溢于言表。他们非常自信地认为西方“多党民主体制”是“金科玉律”,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认为西方政党制度是最为有效而可行的政治制度,为此目空一切,高高在上,并洋洋得意,结果是迟滞和阻碍了其应有的调整与变革。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与蔓延,则进一步地从经济向政治领域暴露出西方政治体制尤其是政党制度的积弊,当然也揭示了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丑陋一面。近年来相继发生的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西班牙“反政党反体制”运动、法国“黄马甲”运动,尤其近期以来西方许多国家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和蔓延,均向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西方传统政治体制发出了相当严

峻的挑战,使得政党、传统政客在选民中的威信扫地、形象恶化,其民意支持率一降再降,诸多的传统主流政党与政治家近年来都纷纷被“沉默的大多数”抛弃,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前总理朱佩无法实现东山再起之梦,乃至像法国社会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这类传统执政党,近来都沦为边缘性小党。相反,西方那些反对现行体制的各种势力和政客却纷纷“意外”地崛起,如“局外人”特朗普战胜建制派主要代表人物希拉里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民粹政党“五星运动”成为第一大党并同极右政党联盟党结盟而实现组阁,就是其典型表现,这无疑向西方传统政党制度敲响了警钟。

五、西方目前民主政治的困境与危机更加反衬出中国政党制度之治,部分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未来政治发展道路探索的希望

自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里,在政党制度、体制层面,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基本主导着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政党政治的失败,更加剧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原来在政治体制上仿效苏联的部分国家的挫折感和孤立感,其中绝大多数国家不得不进行“政治转向”,主动或被动地搬用西方的所谓“多党民主”与“选举竞争”制度,结果在不少国家带来严重的“水土不服”现象,有的甚至在党争过程中引发军事政变和种族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近20多年来,亚非拉地区有二三十个国家因政党争斗发生过40多次军事政变,不少都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西方多党制并非政治民主建构的“圭臬”,也不是能够解决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和实现政治社会稳定问题的“灵丹妙药”。包括希腊左联党国际书记布尔诺斯、帕潘德里欧基金会主席政治顾问弗佐普洛斯等在内的一些西方政治家、学者近期在与笔者交流、访谈时表示,“世界上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建立怎样的政党制度,实行何种政治模式,无疑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本国不同政治力量对比、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交互作用的

^① 禹海霞:《政党变革、政党体制变革、政党政治变革含义辨析》,《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结果，而不能盲目比照”。他们认为，“实现民主的路径和形式应该是多样的，盲目照搬别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不可能取得成功”。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客观的分析、理性的声音目前还未能成为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主流声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道路，已为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借鉴启示。正因为如此，当今越来越多的国外政党和专家学者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所进行的政治道路探索及成功实践经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影响，乃至对其寄予厚望。包括哈萨克“祖国之光”党、蒙古人民党、俄罗斯公俄党、希腊左联党等政党及一些专家学者大都认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影响与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是一种“既不是两党制，也不是一党制，它是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反复探索出来的‘无在野党制度’，它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第二，“中国对政党制度的积极探索为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这在于“它以合作和协商代替相互攻击，用广泛参与来凝聚不同群体的共识，这是政治民主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探索”，并且为世界政党制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第三，中国政党制度探索所表现出的榜样作用，无疑将会激励并推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主动地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哈萨克几个主要政党认为，中国制度的政治、经济红利不应局限于中国一国，而应当走向世界、造福世界。“中国特色”并非“中国一家”，或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特色”。当前，个别西方政要和专家学者也承认，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就是不了解中国的政党制度。英国保守党下院议员阿弗拉米就强调，在国家治理上，“西方应放弃成见，重新认识包括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各项制度”。阿尔布劳甚至表示，“中国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

总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与完善，充分地表现出我们对待政治民主制度的一种负责任态度和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创新精神。在当前世界之乱的背景下，中国之治表明

的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我们更有理由为此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2] 钟清清主编. 世界政党大全[M].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1994.
- [3] 王家瑞主编. 当代国外政党概览[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 [4] 赵晓呼主编. 政党论[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 [5] 刘洪才主编. 当代世界共产党党章党纲选编[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 [6] 韩庆祥等著. 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7] 唐君等主编. 国外政党执政镜鉴[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作者：唐海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研究员
章德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毛军吉